



# 苏美尔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 社会复杂化之路

## ——兼谈苏美尔文明与良渚文明的初步对比

◆ 陈明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苏美尔文明和良渚文明分别是西方文明圈和东方文明圈的代表，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的地区之一。它们所代表的苏美尔地区和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序列较为完善，考古工作研究较为深入，社会复杂化具有大致的同步性，但又各有特点，反映出两种不同文明模式。

**关键词：**苏美尔文明；良渚文明；社会复杂化；文明对比

**Abstract:** Sumerian civilization and Liangzhu civilization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ircle and oriental civilization circle respectively and are one of the first regions in the world to enter the stage of civilization and early nations. The cultural sequence of the Sumerian region and the Taihu Lake region represented by them is relatively perfect,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is more in-depth, and the social complexity has roughly synchronism, but each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the two different modes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umerian civilization; Liangzhu civilization; Social complication; Civilization contrast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位于整个旧大陆西方文化和文明圈的中心位置，从距今八九千年的哈拉夫时代前后开始，起源于新月沃地（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上游）的许多文化要素就开始逐步向尼罗河流域、安纳托利亚、爱琴海沿岸、印度河流域和中亚等地区扩散，如大麦、小麦、山羊、绵羊、黄牛、泥砖、制铜技术等<sup>①</sup>。距今 8500 年前，在这一波文化传播的浪潮中，在苏美尔地区形成了最早的居民，他们创造了欧贝德文化，经过三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苏美尔文明（距今 5350-4350 年），这一文明被认为创造和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明和文字，同时也可能是《圣经》中大洪水事件的起源地，从而被西方人视为经典的文明样本，在整个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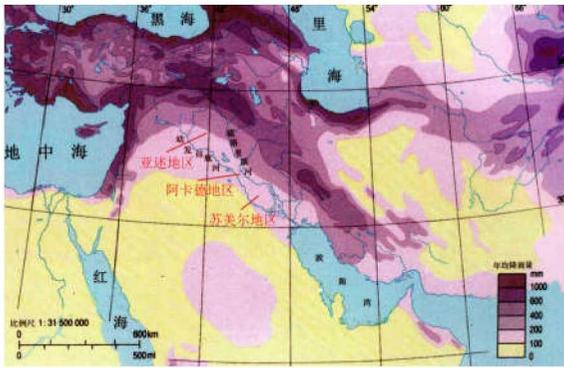
地位。

良渚文明年代与苏美尔文明接近，年代距今 5300-4300 年，是旧大陆东方文明圈的重要代表，本文拟尝试从地理环境、文化序列、社会进程、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综合对比研究，以辨析两者之异同，并通过对比研究了解良渚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

### 一、地理环境

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2032 千米）和幼发拉底河（2720 千米）流经的区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地区”），包括伊拉克全部以及叙利亚、土耳其部分，东北为扎格罗斯山、北部

为陶鲁斯山和黎巴嫩山区、西南为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高原,是一处被高大山脉和高原包围、东南面向波斯湾的独立的地理区和文化区,南北约 1000、东西约 50-300 千米,总面积约 17 万平方千米。美索不达米亚可以希特和萨马拉为界分为北部高原区(亚述地区)和南部平原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以尼普尔为界细分为南部操苏美尔语的苏美尔和北部操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尼普尔是苏美尔地区最北部的城邦,再往北的基什和迪亚拉地区则已属阿卡德地区,尽管语言有差异,但从欧贝德时代一直到早王朝时代这两个小区的文化面貌一致,社会发展水平相当,文化、经济、政治交流密切,因此,下文中我不做区分,而暂时采用苏美尔地区一词来指代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图一 西亚及美索不达米亚降水分布图

(引自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2014年)

苏美尔地区是在两河冲积及海平面上升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海拔 3-30 米,北至巴格达一带,距今 8500 到 4300 年期间,现今两河汇入波斯湾的河口及沼泽地区还没成陆,乌尔、埃利都、拉伽什等遗址距海并不远,这时苏美尔地区(指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下同)南北约 350 千米、东西约 50-200 千米,面积约 4.5 万平方千米。这一区域地势低平,平原沼泽密布,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非常有利于灌溉农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但缺乏铜矿、石材、木材等重要的自然资源,且两河支流众多,蜿蜒曲折,泥沙沉积形成地上河,经常发生因河道改道而导致古代城市衰落的情况,洪水也是古代社会的一大威胁,尤其是春季上游冰雪融化之时,而这一时间恰好是大麦小麦等作物成熟的季节。气候属亚热带干旱半干旱气候,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仅 115-135 毫米,全年有 8 个月无降雨,夏季漫长无雨,对秋季作物的播种造成很大的影响,必须仰仗于人工灌溉,但频繁的灌溉也导致该地区常常受到土壤盐碱化的影响。

这一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但缺陷同样突出,社会的发展进程极易受到洪水、河道改道、干旱、土壤盐碱化等因素的影响(图一)。

环太湖地区是在距今 7000 年前后才逐渐成陆的,并逐渐形成了与现在接近的地貌环境。相比于苏美尔地区,环太湖地区面积稍小,为 3.65 万平方千米,同样位于大河入海口一带,地势低平,海拔多在 3 米左右,河网密布,水源和土壤条件接近,都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水产资源也都很丰富。相比而言,环太湖地区的气候更佳,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夏季前后梅雨和台风也会带来大量降雨,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100 多毫米,夏季偶发洪水和干旱,并对该区域唯一的农作物水稻的收成造成威胁。环太湖西依天目山脉,石材、木材等资源丰富的,或许也出产玉材,自然资源相对更为丰富。

## 二、苏美尔地区的文化序列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代表的近东地区最早的陶器出现于距今 9000 年前后,如果按照中国考古学家的惯例,以陶器组合作为辨析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准,则这一时期也是近东地区考古学文化起源的时间,大致与中国的裴李岗时代起始时间一致。根据杨建华等人对两河流域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sup>②</sup>,可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距今 9000-4300 年的历史划分为哈拉夫时代(距今 9000-7500 年)、欧贝德时代(距今 7500-6000 年)、乌鲁克时代(距今 6000-5100 年)、早王朝时代(距今 5100-4350 年)。在哈拉夫时代之前的前陶新石器时代(距今 11500 至 9000 年)和纳吐夫时代(距今 13500-11500 年)晚期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就已有人类活动。早王朝时代之后可称为阿卡德时代,可分为阿卡德时期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两个阶段。早王朝末期,从乌玛起步的国王卢伽尔扎吉西攻占了乌鲁克、乌尔、拉伽什、基什,并地中海沿岸和海湾地区进行过远征,进行了开创帝国的首次尝试,但很快就宣告失败了,随后不多久,闪米特人萨尔贡以基什阿卡德为基础,建立了阿卡德帝国(大约公元前 2334 至 2191 年),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纳入其统治版图。阿卡德王朝覆亡后不久,乌尔城的乌尔纳木开创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 2112 至公元前 2004 年),使苏美尔文明再次延续了 100 来年,随着来自东边的阿摩利人的侵扰和埃及人的袭击下,乌尔第三王朝灭亡,苏美尔语被放弃使用,苏美尔文明彻底消亡。

哈拉夫时代以萨马拉文化尤其是哈拉夫文化为代表,又可以距今 8500 为界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萨马拉时期,仅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分布有两支考古学文化,分别为偏北的哈苏纳文化和偏南的萨马拉文化,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其中萨马拉文化在其晚期阶段占据了哈苏纳文化的分布范围,从聚落和墓葬材料可知二者均为社会分化不明显的平等社会。第二阶段可称哈拉夫时期,哈拉夫文化兴起并向外扩张至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完成了北部的文化整合,同时萨马拉文化在哈拉夫文化影响下向南迁徙,在苏美尔地区形成欧贝德早期遗存<sup>③</sup>,哈拉夫文化中聚落之间差异不大,一般数万平方米,但出现为多个村落服务的神庙或祭室,同时发现有随葬较多石制或铜制的管珠及石质印章、护身符的较大型墓葬,可知哈拉夫文化是西亚最早进入社会已初步分化的等级社会的考古学文化(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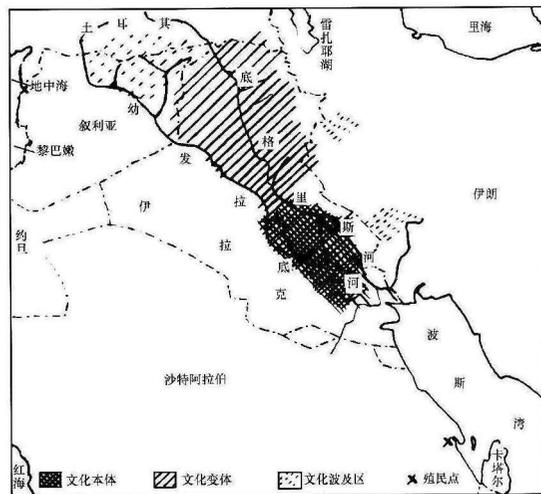


图二 哈苏纳、萨马拉、哈拉夫、欧贝德等遗址分布图

(引自布朗主编、王淑芳译:《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欧贝德时代以欧贝德晚期阶段为代表,从欧贝德晚期阶段开始,以苏美尔地区为核心,向北传播,逐步占领了两河流域北部的哈拉夫文化分布区,完成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整合,影响所及还达到叙利亚西部及土耳其南部,以及伊朗东南部及东北部,甚至在叙利亚的地中海边和沙特阿拉伯西南波斯湾沿岸建立了“殖民点”<sup>④</sup>,形成了一支非常强势且幅员广阔的文化系统。陶镰广泛使用,灌溉农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渔猎仍占较大比重,并通过扩张得到了更多的铜矿、木材、石材等自然资源,刺激了贸易和交换的发展,铜器已经出现,但数量极少,器类简单,还未成为主要的手工业门类,此时已有刻符筹码一类的记录手段和大量印章等与经济 and 贸易有关重

要遗物。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神庙为中心的具备城市雏形的中心聚落(如埃利都、乌尔)和无神庙的一般聚落(如欧贝德),遗址面积最大者已达 10 至 15 万平方米,埃利都是崇拜水神恩利的中心,其神庙建筑在欧贝德最晚期面积达 276 平方米,且结构也日趋复杂,这时已产生居住于神庙垄断了祭祀权并掌控着剩余农产品再分配的专职祭司阶层,达到了神权和财权的垄断,成为社会的最上层。从墓葬材料来看,埃利都神庙区以南发现这一时期包含 800-1000 座墓的大型墓地,但随葬品都比较少,一般 1-7 件,最多也就 12 件,随葬品仅陶器和少量黑曜石珠、贝珠一类的装饰品,未发现随葬品较丰富的大墓和专门的大墓墓区<sup>⑤</sup>。尽管如此,从祭司阶层的出现还是说明了欧贝德晚期已是社会分化达到较高阶段的阶层社会。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直到公元前 8 世纪的亚述时代,苏美尔地区的发展水平都要高于北部(图三)。



图三 欧贝德文化系统的形成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首次文化整合,约距今 7500-6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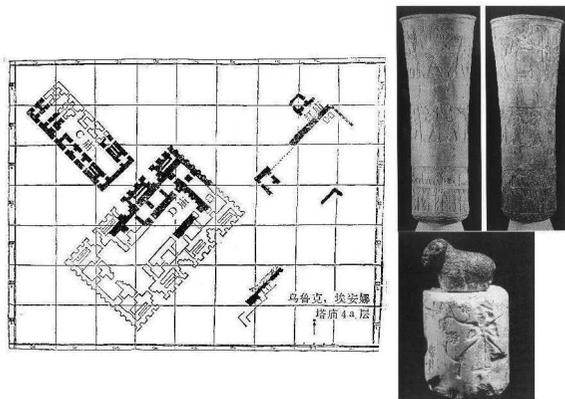
(引自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2014年)

乌鲁克时代以乌鲁克文化为代表,它继承欧贝德文化发展而来。根据乌鲁克等遗址的分期,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距今 6000-5800 年,中期距今 5800-5350 年,晚期距今 5350-5100 年<sup>⑥</sup>。乌鲁克文化与欧贝德文化一样,对两河流域北部、伊朗等地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苏美尔地区乌鲁克时期的农业向集约化发展,灌溉系统分布广泛,在乌鲁克晚期的泥板文书和圆筒印章上可见到犁的形象,说明当时已进入犁耕农业阶段,灌溉农业和牲畜饲养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生计来源,快轮技术的发明和普及使陶器生产专业化,

金属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但仍落后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且器型简单,主要为凿、锥、针、扣等小型工具、装饰品,同时首次出现金质装饰品等贵金属产品,成为祭司和贵族显示身份地位的重要遗物,手工业的发展使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员数量大增。乌鲁克晚期开始出现的圆筒印章是手工业专门化和贸易活动强化的标志,印章上的各种题材的图案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产生活、社会等级、宗教信仰提供了直观的资料。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记录系统的发展过程起始于距今1万年,筹码、空心泥球、数字泥板以及印章、印泥都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与贸易和交换密切相关,乌鲁克晚期发明了还缺乏表音符号的泥板象形文字,共有700多个符号,其中80%以上的内容都与经济有关<sup>①</sup>。乌鲁克时代苏美尔地区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及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以获得铜、银、铅、木材和石材,和东部的伊朗、阿富汗、高加索地区,以获得青金石、玉髓,与南部波斯湾地区的交流则变得有限<sup>②</sup>。

神庙在欧贝德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原有神庙的基础上不断修建新的神庙,使神庙的台基越来越高,神庙本身的建筑结构日益复杂,并往往装饰金、铜嵌板,出现复杂的马赛克装饰,神庙是城市的核心,是宗教中心、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如乌鲁克遗址埃安娜神庙区清理6个不同时期的神庙建筑,最晚阶段D庙和C庙面积分别达4400和1188平方米,神庙区内出土的石膏瓶浮雕画面中,埃安娜女神及为之服务的祭司阶层位于画面最高处,其下为身负祭品的人群及各类供物,反映了僧侣阶层的地位日益提高。这时城内的神庙即祭司居住区以外依次分布着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农业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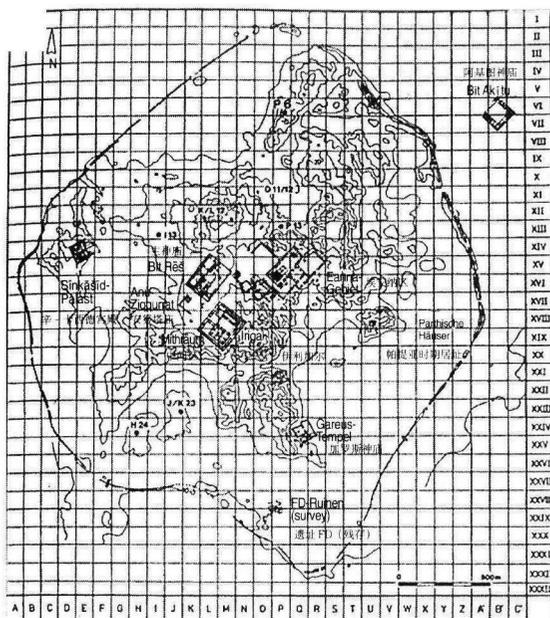


图四 乌鲁克城址的核心神庙区

(左,引自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文物出版社,1990年)及同时期的石膏瓶、圆筒印章(右,引自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

居住区,社会被划分为至少三个阶层,但这时还没出现单独的宫殿区,因此世俗王权即使已经产生,也还比较弱小,只能依附于神权(图四)。

乌鲁克时代大型遗址面积已达数十万平方米,其中乌鲁克遗址作为祭祀安努和爱神伊斯塔尔的中心,从乌鲁克早中期的20万平方米发展到乌鲁克晚期的100万平方米,是乌鲁克时代最大的遗址,根据亚当斯的经典研究,乌鲁克早期乌鲁克遗址是唯一的中心,周边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36处遗址,乌鲁克中期美索不达米亚出现5个中心聚落,其中苏美尔地区有乌鲁克、尼普尔,并存在若干次级中心及大量村落,乌鲁克晚期发生巨大的变化,形成乡、镇、城、都四级聚落结构,其中乌鲁克遗址是唯一的都邑级别的聚落,周边分布有100余个面积1万至20万的遗址<sup>③</sup>(图五)。



图五 乌鲁克城址的聚落形态,约距今5000年  
(引自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

苏美尔地区墓葬材料较缺乏,而位于北部高拉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最丰富的墓葬资料,包含墓葬约200座,墓地中共出土青金石、象牙、绿松石、玛瑙、黑曜石、石英等多种质地的管珠25000件以上。墓地中乌鲁克早期就已存在分化,到乌鲁克晚期更为突出,表现为一群位置特殊且集中分布的墓葬中开始出现金银、青金石、象牙等外来材料制成的手工制品,发现一批贵族大墓,如随葬金银狼首权杖头、矛、青金石印章等重要遗物的M114和随葬45颗原产自阿富汗的天青石珠、750多枚产自印度洋的贝饰的M109等<sup>④</sup>。

乌鲁克早中期仍处于阶层社会,而乌鲁克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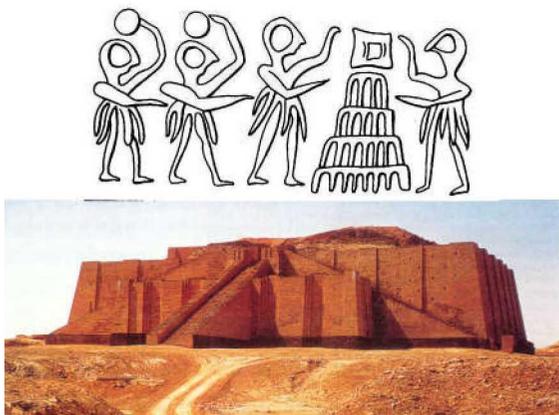
则正式迈入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乌鲁克作为唯一的都邑,有可能也是苏美尔地区的政治中心。乌鲁克晚期至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的圆筒印章、许多动物艺术形象甚至象形文字被古埃及人所借鉴,在古埃及文明的成长中发挥了一定作用<sup>①</sup>。

早王朝时代可分为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和早王朝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时期的遗存很难通过调查来区分。其中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约距今 5100—4900 年,早王朝时期距今 4900—4350 年,早王朝又可分三期,一期距今 4900—4750 年,二期 4750—4600 年,三期 4600—4350 年(三期可以距今 4500 年为界细分为早晚两段)。

早王朝时代农业进一步发展,这时期更有效率的石镰取代了欧贝德时代和乌鲁克时代常用的陶镰,到早王朝三期,一件圆筒印章上出现了双畜牵拉的犁耕图像,铜镰的使用也增加了,牲畜饲养发达,种类有山羊、绵羊、牛以及猪、鸭、鹅等<sup>②</sup>。两河流域开始出现合金技术和锡青铜,苏美尔地区取代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成为新的金属制造业中心,苏美尔人利用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波斯湾地区得到的铜矿和金银矿,制作出武器、工具、装饰品、容器等种类丰富的金属制品,并熟练掌握了合金技术、铸造法、锻造法、镂雕、浮雕、线雕、微雕、镶嵌等多种工艺。在乌鲁克遗址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的神庙区中,发现使用失蜡法制作的小型狮子像、装饰小牛像的别针,并发现金属矿堆等遗存<sup>③</sup>,说明这时金属制造技术是被神庙区控制的,随后的早王朝时期青铜铸造工艺达到高峰,可铸造真人大小的人像及仅 7 厘米高的微型驴车。农业的发展及金属制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的进步使苏美尔地区的对外贸易达到繁荣的地步,贸易网络更为完善,当时苏美尔人与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以及波斯湾等进行直接了贸易往来<sup>④</sup>,以获得铜和闪长岩、绿泥石等资源,同时还以这些地区为中转站与距离分别达 1700 和 2500 公里的古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建立了贸易联系<sup>⑤</sup>。

各城邦都建有神庙(多为高耸的塔庙),神庙或以壁画、镶嵌饰带等装饰,每个城邦都有各自的主神或保护神,如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乌鲁克遗址再次重建了乌鲁克末期已经废弃的埃安娜神庙,在其西部又兴建了相对高 11 米的祭祀苏美尔主神之一主神安努的神庙;尼普尔成为相对独立的宗教圣城,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是苏美尔主神之一恩利勒的祭祀中心,其地位类似于欧贝德至乌鲁克时代的埃利都。但总体上这一时期的神庙材料不多,不妨以苏美尔时代之后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金字形塔庙为例加以

说明,这是在原先的遗址台墩上建立起来的三层式塔庙,内芯为泥砖砌筑,外表贴砌烧砖,其中第一层台基规格为 62.5×43、高 11 米,第二级和第三级台基又分别抬高 5 米和 2.9 米,复原总高度约 19 米。从苏美尔神话可知,苏美尔的神可分三个不同等级,其中天空之神安努、大气之神恩利勒、水神恩奇是三位主神,第二等级神灵有太阳神乌图、月神南那、爱与战争之神伊南娜等,第三等级神灵有野生动物之神宁吉尔苏等<sup>⑥</sup>。早王朝一期只有神庙,二三期开始出现类似宫殿的大型公共建筑(基什、埃利都),国王也成为土地的拥有者,从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城邦间的战争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王位的世袭渐成定制,这些都反映了世俗王权正在日益强化,但国王的权力仍受限于祭司阶层和公民大会,尚不具备绝对权力,国王同时也需要履行许多的宗教义务,流传下来的许多早期楔形文字文献(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木法典和里皮特·伊丝塔法典)无不宣扬君权神授的观念<sup>⑦</sup>。更晚的阿卡德王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开始有国王自称为神,从而真正达到王权、军权、神权和财权的垄断(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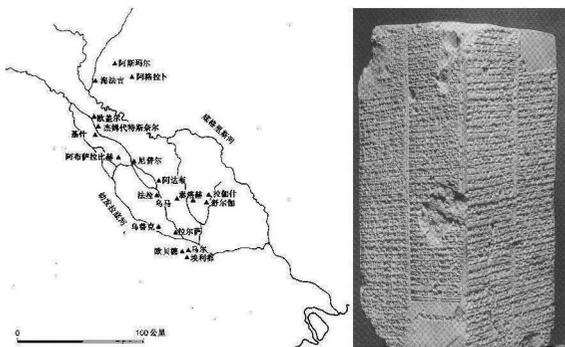


图六 早王朝时期圆筒印章上修筑金字形神塔的图案

(上,引自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及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金字形神塔(下,引自李建群:《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经过捷姆迭特那斯尔的发展,早王朝时期文字系统日渐成熟,从象形文字发展为抽象的楔形文字,并出现了表音符号,除了主要的经济方面的内容,还出现了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书信、奉献铭文等各种形式的文字记录,从乌尔第三王朝流传下来的楔形文字文本记录了许多早王朝时期(主要是早王朝三期)的历史事件,如苏美尔王表、吉尔伽美什史诗等。

早王朝时代的遗址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数量众



图七 苏美尔早王朝时期主要城邦分布图

(左,引自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及苏美尔王表(右,引自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多、分布密集,总数达 1659 个。距今 5000 年前后,乌鲁克遗址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城墙,面积达 550 万平方米<sup>⑧</sup>,据估计其内居住有四万人口,但乌鲁克遗址的地位从早王朝时期开始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逐渐失去了先前的突出地位,苏美尔地区先后兴起 30 余个城邦,除乌鲁克外,还有拉尔萨、乌尔、埃利都、欧贝德、拉伽什、舒尔伽、泰洛赫、乌玛、法拉、阿达布、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等,它们之间为争夺霸权和资源常常发生战争,根据苏美尔王表等文献的记载,早王朝时期的政治中心地位是在几个城邦中轮流转换的,基什、乌鲁克、乌尔、阿万(属埃兰地区)、阿达布、拉伽什、乌玛等都曾先后夺取过霸权并建立

王朝(图七)。

早王朝时代,在在乌尔、基什、欧贝德等遗址均有墓葬发现,尤以乌尔遗址(早王朝晚期早段的重要城址,面积 50 万平方米)最为丰富和重要,墓葬多为单人曲肢葬,以土坑墓为主,同时也开始出现泥砖砌筑的穹窿顶墓。乌尔遗址中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至早王朝一二期的墓葬材料显示随葬品丰富的大墓集中分布的现象,随葬品有石碗、金属制品、宝石质装饰品等,该遗址更为重要的发现是一处早王朝三期至阿卡德时期的 1850 座墓葬,其中 400 座明确属早王朝三期早段,其中心位置是有 16 座带墓道的砖石砌筑的穹窿顶大墓,既有男性墓又有女性墓,大墓墓群周围围绕着大量同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包括 M789、M800(王后普安比之墓)、M1237(殉葬达 74 人)、M1050(阿卡拉木都之墓)等,出土大量极其精美的金银铜制品,如被称为“军旗”的嵌板、公牛头竖琴、公牛像、剑、头盔和各种容器,还常见殉人、殉牛车的现象。这个墓地还发现专门埋葬士兵的墓地,共 96 座,均为男性,随葬青铜剑、斧、矛等武器及少量陶器,结合乌尔军旗上的步兵和骑兵形象,都说明当时不仅存在战士阶层,而且出现不同的军种。此外,乌尔遗址还发现乌尔第三王朝国王舒尔吉和阿玛尔·辛等人的墓葬<sup>⑨</sup>(图八)。



乌尔军旗



图八 乌尔城址平面图

(引自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文物出版社,1990 年)及乌尔王陵出土金银器(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 年),约距今 4600-4500 年

### 三、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序列 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如果以陶器组合作为辨析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也起始于距今 9000 年前后,可分为裴李岗时代(距今 9000-7000 年)、后冈时代(距今 7000-6000 年)、庙底沟时代(距今 6000-5300 年)、良渚时代(距今 5300-4300 年)、龙山时代(距今 4300-3800 年)。整个中国范围内可以划分为多个文化区,如中原地区、关中地区和环太湖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平原、西辽河地区、甘青地区、四川盆地等,其中良渚文明所在的环太湖地区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序列较为完善的文化区。裴李岗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系统共发现 160 余处遗址,其中贾湖文化(指贾湖遗址二、三期)和裴李岗文化已经分别出现随葬品达 60 余件的大墓(M277 和 M282,随葬骨笛、骨板、龟甲及配套的石子等特殊遗物)和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但此时大墓与小墓混杂,还未形成大墓墓区,说明这时还没进入阶层社会,而处于社会已经分化的等级社会,发展水平与美索不达米亚同时期的哈拉夫文化接近,但此时环太湖地区只在极少数靠山的遗址发现有跨湖桥文化因素的遗址,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与之后的文化序列无关<sup>⑨</sup>,随后即为前后相接的马家浜时期(距今 7000-5900 年)、崧泽时期(距今 5900-5300 年)、良渚时期(距今 5300-4300 年)以及钱山漾时期(距今 4300-4100 年)和广富林时期(距今 4100-3800 年)。

#### 马家浜时期

可以距今 6300 年区分早晚两个阶段。

马家浜早期约距今 7000-6300 年,这一时期为环太湖文化区的形成阶段,在双墩文化的南向影响,形成骆驼墩文化及其派生的吴家埠遗存、邱城遗存、祁头山遗存和罗家角遗存,遗址数量仅 10 处左右<sup>⑩</sup>。遗址面积不大,差异不明显,未出现中心性聚落。从墓葬、房址等遗迹看不出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现象。生计类型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稻作农业为辅<sup>⑪</sup>。遗物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手工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未发现奢侈品,可能已有玉器制作的装饰品,但数量不多。遗址分布于靠山的环太湖西部地区。这一时期是社会分化尚未出现的平等社会,发展水平接近于苏美尔地区的欧贝德早期阶段。

马家浜晚期距今 6300-5900 年,遗址数量大增,达 75 处。在来自中原和皖北的后冈一期文化文化系统和侯家寨文化的影响下,太湖东北、太湖以西、太

湖以南分别形成圩墩文化、薛城文化和庙前文化<sup>⑫</sup>。遗址面积差异较大,东山村为太湖东北的中心聚落,三星村为薛城文化的中心聚落,与环太湖相邻的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则是北阴阳营文化的中心聚落。玉玦、玉璜等玉器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此时还主要作为武器或工具的石钺也已出现。遗址仍主要分布于环太湖西部地区,并逐步向东部地区及相邻的金衢盆地和宁绍平原扩展,形成了比较大的文化系统,整个文化系统遗址总数已达 120 余处,这时环太湖地区与江汉平原、海岱地区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首次发掘出小规模有简单灌溉的水稻田遗迹(草鞋山、绰墩),马家浜时期尤其是马家浜晚期水稻性状渐趋稳定并逐渐达到现代驯化水平,说明了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sup>⑬</sup>。公元前 4000 年前后,东山村遗址出现编号为 M101 的早期的权贵大葬,墓中随葬品共 33 件(套),其中玉器 21 件,玉器种类有玉璜、玉玦、玉管等,均为装饰用玉,尚未出现礼仪性玉器,说明 M101 墓主属富裕阶层,但尚未获得特殊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尽管如此,M101 的出现足以说明马家浜晚期已发展为社会达到一定分化的等级社会。但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欧贝德晚期,而与更早的哈拉夫文化接近。值得注意的是,M101 与随后崧泽早中期大墓位于同一墓地,后者可能是 M101 继承者们的墓地。

#### 崧泽时期

一般根据南河浜等遗址的分期,可将崧泽文化分为早晚两期。

崧泽早期距今约 5900-5600 年,遗址数量不明,大概与马家浜晚期接近或有少量增加,向太湖东部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时崧泽文化与分别分布于江汉平原、海岱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大汶口文化之间有密切的文化交往,构成围绕中原地区的半月形文化带,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发现是东山村遗址,遗址面积接近 27 万平方米,I 区主要埋设小型墓葬,II 区主要为居住区,III 区则主要埋设大型墓葬,功能分区明显。清理了一批崧泽文化早中期的贵族大墓,III 区清理墓葬 15 座、灰坑 4 座、灶 2 座,其中 M76、M83、M85、M87、M99 这五座墓葬随葬品较少,共 5-13 件,另有 10 座崧泽文化早中期的大型墓葬共同组成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的墓地,墓坑一般长 3、宽 1.6 米,随葬品多在 30 件以上,以陶器为主,玉石器为辅<sup>⑭</sup>。玉器数量大增,除了玉玦、玉璜、玉镯、管珠等装饰品之外,新出现玉钺(东山村、仙坛庙、南河浜),石钺也普遍随葬,说明当时已经出现礼仪化的世俗权力并被一个特定的阶层所掌控,李伯谦先生

认为这一时期已出现初级王权,从而进入复杂社会的高级阶段——古国阶段<sup>⑧</sup>。大约同时期凌家滩和大汶口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社会分化现象。此时已进入阶层社会,发展水平接近于欧贝德晚期至乌鲁克早期。

崧泽晚期约距今约 5600—5300 年,遗址数量约 130 处。此时环太湖东部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新建了大量人工营建的台墩型遗址,尤其是嘉兴一带的海宁桐乡海盐遗址群,聚落分布相当密集。遗址面积最大者达三四十万平方米,赵陵山遗址面积为 16 万平方米,最早阶段的遗存即属崧泽晚期,发现这一时期经过多次人工营建的面积超过 6500 平方米的土台,人工堆筑厚度约 4 米。这一时期,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石犁等农业工具开始出现并普及,标志着农业发展从耜耕进入犁耕阶段,稻作农业正式取代渔猎采集成为最主要的生计类型,筑土堆墩则成为营建遗址的主流方式,这一过程需要更多的人力协同工作,这些都无疑有利于推动社会复杂化的发展<sup>⑨</sup>。遗憾的是,赵陵山等崧泽晚期的遗址不少经过大规模发掘,但目前未能发现超过东山村崧泽早中期大墓墓地的相关材料。专业化生产的多种多样的素面为主的陶器组合,反映了当时陶器制作的水平和生活内容的多样化,尤其是新出现一批塔形壶、人首壶、鹰首壶、陶龟等为代表的祭祀用器<sup>⑩</sup>。

#### 良渚时期

良渚时期大体可以距今 4900 年为界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可分为前后两段,早段约距今 5300—5100,晚段约距今 5100—4900 年。遗址分布相当密集,不完全统计或有上千处遗址。根据良渚古城所在的 100 平方公里范围的不完全勘探资料,良渚古城所在的 100 平方公里范围就已确认近 300 处台地遗址<sup>⑪</sup>。根据最新三普资料,桐乡海宁海盐遗址群也有 200 余处遗址。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环太湖地区 3.65 平方公里;良渚文化系统分布达于宁镇地区、苏北地区、金衢盆地、宁绍平原等,面积约 15 万平方公里;影响区范围更大,如同时期的大汶口、石峡、屈家岭等均受到良渚文化或多或少的影 响,面积约 70 万平方公里;传承区是指龙山时代良渚式玉琮、玉璧等分布区,这一传承区范围极为宽广,囊括了甘青、晋南、陕北、江汉平原等中国中东部的绝大部分范围,面积约 170 万平方公里。

良渚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是在崧泽时期奠定的,但良渚文化并没有继承崧泽文化以世俗权力为主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采用了凌家滩文化以神权和王权相结合的模式,良渚古城及良渚文明的兴起

或许与凌家滩为主体包括宁镇地区和西苕溪流域为代表的的人群的涌入、玉礼器系统的传入及其文明模式的移植有着密切关系<sup>⑫</sup>。140 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随葬大量玉石礼器的大型墓地以及面积达 1200 平方米的祭坛的发现证实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早在相当于崧泽早中期这一阶段就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其发展水平甚至超过乌鲁克中期,已无限接近乌鲁克晚期。

良渚早期早段的代表性遗址有太湖西南部的瑶山、汇观山、官井头、玉架山,太湖东南部的普安桥,太湖东部的张陵山、赵陵山、福泉山以及太湖北部的高城墩、罗墩等。其中太湖西南部的良渚区块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遗址均不超过 10 处,到良渚早期早段一跃成为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域,其中瑶山为特意选址修建的仪式中心和王陵墓地,瑶山墓地共发现 13 座大墓,墓葬之间等级差异明显,其中 M12 尽管被盗,但出土大琮(大琮目前仅发现于良渚早期的瑶山 M12、反山 M12 和良渚晚期的寺墩 M3,很可能是王权和最高神权的排他性标志物),推测墓主为良渚文化第一代王者,玉礼器系统(除玉璧)已经创立,反映统一信仰的神徽已经形成,玉礼器系统及神徽信仰开始对外辐射,玉架山、高城墩等相关玉琮的发现<sup>⑬</sup>大致可认为是统一王权和神权的对外扩张和影响的产物。

良渚早期晚段太湖西南部的良渚区块继续发展,良渚古城的主体框架在距今 5000 年前后基本成型,城内的反山、姜家山、莫角山,城外的水利系统和城墙大概都在这一时期陆续完成<sup>⑭</sup>,土方量达 917 万立方米<sup>⑮</sup>,古城系统占地面积已达 100 平方公里,包括临平遗址群在内的城市腹地面积 1000 平方公里。反山墓地中共清理 9 座良渚早期晚段的大墓,墓葬之间存在一定的等级差异,其中最高等级的墓葬 M12 出土王权和最高神权的排他性标志玉琮王(即大琮)和玉钺王,推测也为一代王者,这时期已经吸收了可能原创于张陵山一带的玉璧,玉礼器系统更为完备,首次出现完整的神徽形象,进一步奠定了良渚古城在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期的其它良渚文化遗址都远远无法与之媲美,严文明先生即指出:“假若良渚是一个国都的话,那么(福泉山、寺墩等)就是各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sup>⑯</sup>。与良渚古城同时的遗址有福泉山、汇观山等遗址。这时,环太湖已经形成都(面积 300 万平方米,仅良渚古城)、城(面积数十万至百万平方米,如福泉山)、镇(面积十余万平方米,如玉架山)、村(面积数千至数万平方 米,如庙前、茅山)四

级聚落结构。

良渚晚期良渚古城的结构继续扩展,达到繁荣期,并扩建外城,最终形成以宫殿区、城内核心区、内城、外城等占地面积达 6.3 平方公里的多重结构的都市格局,外围发现数百处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的台墩遗址,占地面积仍有 100 平方公里左右。可惜未发现这一时期的王陵级别的墓地。这时太湖北部的寺墩遗址面积发展到 90 万平方米,寺墩 M3 属良渚晚期晚段,墓中随葬大琮,遗址内另采集大琮 1 件,推测在良渚晚期晚段寺墩成为与良渚古城竞争的政治实体。另外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遗址还有横山、姚家山、邱承墩、草鞋山、福泉山等。

良渚文化时期水稻是唯一的农作物<sup>⑤</sup>且稻作水平非常发达,茅山遗址发现面积达 55000 平方米的良渚晚期大型稻田区,测算水稻亩产达 141 公斤<sup>⑥</sup>,古城内发现储藏量分别达 2.6 万斤和数十万斤的碳化稻谷堆积;家畜饲养以猪为主,另有狗,动物骨骼中家猪的比例普遍达到 80% 左右。手工业发达,除了陶器、石器一般的手工业产品,还出现高端手工业如玉器、漆器制造业,可能也有丝织业<sup>⑦</sup>。神权和王权在良渚社会中地位突出,神徽信仰普遍存在于整个环太湖地区并贯穿早晚<sup>⑧</sup>,不同区域出土神徽大同小异,几乎达到一神教的地步<sup>⑨</sup>。从墓地看社会等级分化,可分为王陵墓地、贵族墓地、平民墓地,可能还有丛葬墓(赵陵山遗址),王陵墓地和贵族墓地基本都是家族式埋葬<sup>⑩</sup>,王陵墓地如瑶山、反山,贵族墓地如高城墩、姜家山、文家山,平民墓地如卞家山,等级差异显著,阶层分化鲜明。遗憾的是,尽管已经不完全统计出 656 个刻画符号,且有不少成组图符,无疑是当时重要的记录系统,堪称原始文字<sup>⑪</sup>,但目前还很难破译。

以上考古成果证实良渚时期已经正式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sup>⑫</sup>,伦福儒先生即给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良渚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sup>⑬</sup>。其年代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苏美尔地区的乌鲁克晚期、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至早王朝时期(距今约 5350-4350 年)。

#### 四、初步对比

从文化序列来看,苏美尔地区文化起步早,从欧贝德早期(距今 8500-7500)到欧贝德晚期(距今 7500-6000 年),苏美尔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都远远高于环太湖地区,同时也高于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直到崧泽早中期阶段至崧泽晚期阶段

环太湖才逐渐赶上苏美尔地区同时期的发展水平。从距今 5300 年前后开始,两地均进入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并延续发展了 1000 年,最后在距今 4300 年前后发生断裂,文明的遗产虽然在后世得到传承,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已经消失。

从经济基础来看,两种文明均极度依赖灌溉农业,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只不过农作物品种不一样,苏美尔文明是小麦、大麦,良渚文明中水稻是唯一的农作物;手工业方面,除了两种文明中均有且高度发达的制陶业、石器制造业,二者的高端手工业部门完全不同,苏美尔文明是铜器制造、金银器制造、宝石制造等,良渚文明是玉器、漆器和可能的丝织品等;贸易方面,由于本地资源的匮乏,苏美尔人发展出广阔的贸易网络并发明了以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为代表的复杂的记录系统,贸易是农业和手工业之外重要的经济部门,而尽管有学者指出“良渚城址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大都会”<sup>⑭</sup>,但环太湖地区总体自身资源较为丰富,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聚落与社会方面,共同点是城市的规模巨大、聚落构成要素齐全、社会等级森严,但二者的聚落布局有较大不同,苏美尔文明的乌鲁克遗址是神庙为中心,神庙占据城市的核心区域,王权在大部分时间处于依附神权的地位,国王大部分时候都只是神的世俗代言人,只有到了早王朝晚期国王的权力才日益增大,并开始出现专门的宫殿区;而良渚古城尚未发现明确的神庙区,宫殿区及与之配套的王陵贵族墓地占据城市的核心区域,由于文字缺乏,目前还难以判断神权与王权的结合方式,但从墓葬中玉琮和玉钺似乎发挥同等作用的情况来看,在良渚王国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可能处于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苏美尔文明在乌鲁克晚期至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可能是以乌鲁克为都城的广幅国家,但在早王朝时期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城邦国家阶段,各个城邦国家相互竞争相继建立王朝,表现为王权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流转,而良渚古城作为良渚文化中唯一带有城墙的超大型都城聚落,规模和等级一直独占鳌头,除了在最晚阶段受到一定挑战外,在大部分时间段都是良渚文明的政治中心,推测其国家形态是以良渚古城为都城的广幅国家。

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苏美尔文明时期是多神一主宗教,每个城邦都有各自供奉的神灵,而尼普尔是整个苏美尔地区的宗教圣城,神灵存在明确的等级划分;良渚文明中神徽的统一性和延续性使我们相信神徽代表了先民的统一信仰,其宗教可称为原

始一神教,良渚古城大部分时间段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宗教中心。

## 五、结语

研究成果表明,距今 5500 前后开始,东西方文明圈已经通过中亚(即“亚洲中部互动圈”,或简称“中亚互动圈”)和北亚地区(即欧亚草原,李旻称之为“北亚互动圈”<sup>④</sup>)有了日益密切的文化和互动。西辽河红山文化和甘青地区庙底沟文化分别出土了玉石和彩陶的权杖头,就被认为是通过中亚、北亚从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其最早的年代约距今 5500 年前后<sup>⑤</sup>;距今 5000-4000 年,如冶金术<sup>⑥</sup>、小麦<sup>⑦</sup>、大麦<sup>⑧</sup>、绵羊<sup>⑨</sup>、黄牛<sup>⑩</sup>、泥砖<sup>⑪</sup>等原产西亚的文化因素也陆续通过中亚和北亚地区,经新疆地区、蒙古高原传入,红山文化、石峁文化中的石头建筑及石头城、人像及偶像崇拜、岩画壁画也可能与中亚、北亚有着密切关系<sup>⑫</sup>,这一波文化因素的扩散推动了西辽河地区、陕晋蒙交界区域等地区的文明进程,刺激了红山文明、石峁文明的产生,其后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系统、青铜文明、广域王权国家和中原中心政治格局也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诞生的<sup>⑬</sup>。

良渚文明距今 5300-4300 年,正当中西文明圈的交流互动方兴未艾之际,但此时偏于中国东南的良渚文明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水稻、家猪、玉器、土木建筑工程(包括草裹泥技术)等均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而暂未发现与西方文明圈接触的迹象,似乎没有卷入这一波“青铜时代世界体系”<sup>⑭</sup>的建构之中,保持着相对的纯洁性和独立性,与良渚文明类似的还有海岱地区的大汶口中晚期和江汉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它们都是根植于当地文化传统的原生性区域文明,共同构成了包围中原的东南半月形地带,这一半月形地带渊源于裴李岗时代(距今 9000-7000 年),扩展于后冈时代(距今 7000-6000 年),到庙底沟时代(距今 6000-5300 年)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油子岭文化开始与中原的庙底沟文化分庭抗礼,至良渚时代(距今 5300-4300 年)则完成对中原的超越,但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又逐渐走向衰落,而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西北半月形地带日益兴盛<sup>⑮</sup>。

良渚文明是稻作文明(水稻几乎是唯一的粮食作物)、城市文明(土筑文明和水利文明)、玉器文明(玉礼器系统所表现的文明)和宗教文明(原始一神教),既有与同时期其它文明类似的特征,又具有独特的面貌,深入研究和探讨良渚文明并持续开展广泛的文明比较研究,无疑将丰富和深化中国乃至世

界文明史的研究。

### 注释:

①a. 余西云、李俊:《欧亚大陆新石器化研究动态》,《考古》2011 年第 4 期;b. 布莱恩·费根著、方辉等译:《地球史——世界史前史导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 年。

②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文物出版社,1990 年。根据原作 1984 年出版的第二版翻译;Yoffee, N.2005.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 A. Carter, Graham Philip. 2010. Beyond the Ubaid: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Late Prehistoric Societies of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③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④ Robert A. Carter, Graham Philip. 2010. Beyond the Ubaid: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Late Prehistoric Societies of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⑤转引自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⑥ Leah Minc, Geoff Emberling. 2016. Trade and interaction during the era of the Uruk expansion Recent insights from archaeometric analys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⑦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⑧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原作于 199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⑨a. Adams, R. McC., and H. J. Nissen. 1972. The Uruk Countrysi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原作于 199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b.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 年;c. 查尔斯·海曼:《古代文明的比较考古学研究》,《首届世界考古论坛会志》,科学出版社,2015 年。

⑩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原作于 199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⑪李海峰编著:《古代近东文明:古代两河流域、古埃

及、波斯等古文明探析》，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⑫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原作于199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⑬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原作于199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⑭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原作于199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⑮此距离分别指苏美尔地区取道黎凡特到达尼罗河三角洲的距离，以及取道波斯湾到达印度河河口的距离，根据文献和考古证据显示海湾地区至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是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帕文明进行贸易和交流的中转站（参考a.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b.乔纳森·马克·基诺耶著、张春旭译：《走进古印度城》，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原著1998年出版）。

⑯a.戴尔·布朗主编、王淑芳翻译：《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b.李海峰编著：《古代近东文明：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波斯等古文明探析》，科学出版社，2014年；c.芭芭拉·A.萨默维尔：《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⑰苏珊·鲍尔著、李盼译：《古代世界史：从苏美尔王表从天而降到古罗马帝国慢慢衰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⑱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⑲a.哈里特·克劳福德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尔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原作于199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b.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年；c.戴尔·布朗主编、王淑芳翻译：《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⑳目前仅发现一处，即属良渚遗址群的余杭火叉兜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晔先生发掘。

㉑陈明辉：《距今6000年前后环太湖流域的文化格局——兼论后冈时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6年。

㉒宋艳波：《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生业经济研究——以动物考古学为视角》，《东南文化》2017年第5期。

㉓陈明辉：《距今6000年前后环太湖流域的文化格局——兼论后冈时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6年。

㉔a.郑云飞、蒋乐平、Gary W. Grawford：《稻谷遗存落粒性变化与长江下游水稻起源和驯化》，《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b.马超超：《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驯化过程——水稻扇形植硅体的证据》，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㉕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文物出版社，2016年。

㉖李伯谦：《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的启示》，李伯谦：《崧泽文化大墓的启示》，《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及《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44期，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10年。

㉗王宁远：《从村居到王城》，杭州出版社，2013年。

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崧泽之美》，文物出版社，2014年。

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

㉚a.张弛：《良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形成过程》，《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b.田名利、甘恢元：《凌家滩文化与崧泽——良渚文化玉器的初步认识》，《玉魂国魄（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c.方向明：《良渚玉器刻纹研究之二——再论龙首纹和兽面纹》，《玉魂国魄（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㉛高城墩与反山、瑶山、塘山、汇观山出土玉器的微量元素组成接近，参考顾冬红、董俊卿、赵虹霞、干福熹等：《江阴高城墩遗址出土玉器的检测和分析报告》，《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和GAN FuXi etc. The non-destructive analysis of ancient jad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Liangzhu sites at Yuhang, Zhejiang. Science China: Technological Sciences December 2010, Vol.53, No.12: 3404-3419. 高城墩的玉器从形制、纹饰与瑶山高度一致，可能是良渚古城的玉工制作并通过良渚古城的统治者分派馈赠出去的，参考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㉜秦岭、刘斌、王宁远、吴小红：《良渚遗址群的形成——年代学初步研究》，《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待刊。

㉝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㉞严文明：《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2日第五版。

㉟赵志军：《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

㊱郑云飞、陈旭高、丁品：《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古稻田耕作遗迹研究》，《第四纪研究》第34卷第1期，2014年。

㊲赵丰：《良渚织机的复原》，《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㊳a.秦岭：《权力与信仰——解读良渚玉器与社会》，《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b.方向明：《控制中的高端手工业——良渚文化琢

玉工艺》,《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

⑨a. 张弛:《良渚文化大墓试析》,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b. 刘斌:《神巫的世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c. 方向明:《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d. 赵辉:《从“崧泽风格”到“良渚模式”》,《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

⑩a. 张弛:《良渚文化大墓试析》,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b. 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⑪a. 良渚博物院:《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b. 曹锦炎、方向明:《浙江地区史前刻画符号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 2008》,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⑫a. 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物》1994年1995年第5期;b.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人民日报》2015年3月6日第7版;c. 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⑬ Colin Renfrew and Bin Liu: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society in China: the case of Liangzhu, *Antiquity* 待刊,中译本见本刊同期。

⑭何弩:《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商品经济模式新探》,《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

⑮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⑯a. 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四期;b. 李水城:《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源》,《赤峰学院学报》,第五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专辑,2011年第2期;c. 田广林、刘安然、周海军:《关于那斯台遗址出土棍棒头性质的再讨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0卷第3期。

⑰a. 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b.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2期。

⑱a. 赵志军:《小麦东传与欧亚草原通道》,《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b. 赵志军:《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⑲赵志军、何弩:《陶寺城址 2002 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006年第5期。

⑳a. 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b.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

究》2010年第30卷第2期。

㉑a. 吕鹏:《试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动物考古》(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b. 吕鹏、袁靖、李志鹏:《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商榷〈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㉒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夷夏先后说》附录二,民族出版社,2012年。

㉓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㉔a. 许宏:《“连续”中的“锻炼”——一个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b. 李宏飞:《铜器对早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试析》,《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c. 许宏:《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中原社会:青铜催生“中国”?》,《大众考古》2015年第11期;d. 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㉕ A.S. Sherratt: Plough and Pastoralism: Aspects of the Secondary Productions Revolution, in *Pattern the Past: Studies in Honour of David Cla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herratt, Andrew G.: What Would a Bronze-Age World System Look Like? Relations Between Temperate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Later Prehistory, *Journal of European Archaeology* 1:2:1-57, 1993. 转引自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夷夏先后说》(附录二),民族出版社,2012年。

㉖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文物》2017年第6期。